



本书曾获2003年美国社会学协会杰出学术著作奖

不由自主的资产阶级

近代早期欧洲的精英斗争与经济转型

Capitalists in Spite of Themselves:
Elite Conflict and Economic Transitions in Early Modern Europe

[美] 理查德·拉克曼 (Richard Lachmann) 著

郦菁、维舟、徐丹 译

014015640

F150.9

14

不由自主的资产阶级

近代早期欧洲的精英斗争与经济转型

Capitalists in Spite of Themselves:
Elite Conflict and Economic Transitions in Early Modern Europe

[美] 理查德·拉克曼 (Richard Lachmann) 著

酃菁、维舟、徐丹 译



北航

C1702626

复旦大学出版社

F 150.9
14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不由自主的资产阶级:近代早期欧洲的精英斗争与经济转型/[美]理查德·拉克曼
(Lachmann, R.) 著;郦菁,维舟,徐丹译. —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 2013. 8

(复旦政治学译丛)

书名原文:Capitalists in spite of themselves: elite conflict and economic transitions in early
modern Europe

ISBN 978-7-309-09964-5

I. 不… II. ①拉…②郦…③维…④徐… III. 资本主义-研究-欧洲-近代
IV. F150.9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184611 号

Copyright© 2000 by Richard Lachmann;

Copyright© 2000 b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Inc.

“Capitalists In Spite of Themselves: Elite Conflict and Economic Transitions in Early Modern
Europe” was originally published in English in 2000.

This translation is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本书经牛津大学出版社授权出版中文版

上海市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 图字:09-2011-070 号

不由自主的资产阶级:近代早期欧洲的精英斗争与经济转型

[美]理查德·拉克曼(Lachmann, R.) 著 郦菁 维舟 徐丹 译
责任编辑/孙程姣

复旦大学出版社有限公司出版发行

上海市国权路 579 号 邮编:200433

网址: fupnet@fudanpress.com <http://www.fudanpress.com>

门市零售:86-21-65642857 团体订购:86-21-65118853

外埠邮购:86-21-65109143

常熟市华顺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 890 × 1240 1/32 印张 13.375 字数 307 千

2013 年 8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309-09964-5/F · 1959

定价: 33.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向复旦大学出版社有限公司发行部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北航

C1702626

内容简介

本书作者为研究国家体系、社会生产关系的学者提供一种不同于马克思主义阶级论的精英视角，为解释资本主义产生的偶然性而非必然性正名，具有深刻的理论意义。

本书涉及欧洲转型和社会学的基本问题及争论。作者首先重新分析西欧变革之前的社会结构，而后展现封建主义因素的重组如何创造了新的资产阶级团体和国家，以及那些更理性的意识形态和实践的信奉者又如何获得了特权。作者观点的每一部分都涉及某些有关欧洲转型的争论，并以英国、法国、尼德兰、西班牙、意大利的精英斗争为例来解释资产阶级产生与经济转型的不由自主。

本书适合政治学、社会学、世界史等相关专业的学者作文献研究索引工具之用，也适合广大对欧洲近代史感兴趣的读者深度阅读。

《复旦政治学译丛》编委会

林尚立 陈明明 牛铭实
Richard Lachmann 王 元
陈周旺 何俊志 刘春荣

《复旦政治学译丛》总序

1979年邓小平同志提出政治学研究要“补课”，随后北京大学、复旦大学等高校陆续恢复政治学专业，从那时算起，中国政治学已经称得上“三十而立”，这意味着中国政治学正臻于成熟。

恢复学科之初，借鉴和参考当代世界政治研究中已有的优秀理论成果，成为中国政治学发展的重要路径之一。20世纪80年代末复旦大学国际政治系着手推动当代西方政治学的译介工作，出版翻译了一批重要的当代西方政治学译著，其中包括阿尔蒙德的《比较政治学》、亨廷顿的《变动社会的政治秩序》、罗伯特·达尔的《现代政治分析》、林德布洛姆的《决策过程》等，这些译著打开了中国政治学的视界，使中国的政治学讲师、学生乃至普通读者第一次系统而直接地接触到当代西方政治科学最具代表性的著作。从那个年代成长起来的一批政治学人，如今已经成为中国政治学的中坚，当年他们的学术研究在很大程度上都曾受惠于这些作品。可以说，在中国政治学的发展历程中，这一倾注了众多政治学人心血的翻译工程功不可没。

时至今日，中国政治学已经取得了长足进步，国内外政治学的交流十分频密，相当一部分政治学者已经直接运用外文文献来进行研究，在顶尖外文期刊上发表论文。但这并不能抹杀译介工作的重要性。须知外文文献获取难度大、代价高，加上阅读起来耗时费力而每每不甚了然，即使对于外语十分了得的研究者而言也未尝不是

如此,长此以往,颇不利于政治学基础理论训练。现实情况是,除非某些狭隘专业领域的文献不得已求助于外文资料,国内大部分研究者尤其是青年学生,还是习惯于通过母语来了解政治学的一般理论知识,更不用说非专业的读者。经由专业政治学者翻译的国外政治学著作,仍然是重要的理论敲门砖,是引领年青学子进入政治学殿堂的捷径。

实际上,当前问题之症结不在于译介工作是否吃力不讨好,而在于它跟不上中国政治学发展的步伐,无法充分满足读者的需求。自从前述译丛出版之后,由于各种原因,国外政治学的译介工作始终处于断续、零星、时而停滞的状态,某些译著的重要性也一时难辨,致使鱼龙混杂、左右视线。最近几年情况虽有所改观,但并不能掩盖政治学译介工作总体上的滞后局面。长远说来,政治学后备研究人才的培养,亦会受到这一现状之掣肘。

基于这样一种考虑,我们决心重拾前辈学者的努力,站在今天世界政治学发展的地平线上,重新开发一套国外政治学的经典译丛。这一想法得到了复旦大学出版社的鼎力支持。在出版社的帮助下,从联系版权到着手翻译,我们的工作进度可以用时不我待来形容。译丛定名为《复旦政治学译丛》,希望它能体现复旦大学政治学对于世界政治学前沿的理解和把握。

《复旦政治学译丛》书目的选择可谓不拘一格。我们不受制于某一题材领域、某一作者群,也不受制于作品出版年代的久远与否。因此,丛书中既有如古德诺《政治与行政》这样的经典,也有最新的、来自于其他学科领域学者的政治研究。书目筛选的唯一标准就是其学术水准、影响力。读者诸君将通过本译丛接触到一些原先在国内并不知名的作者的作品,而事实上这些作者在政治学界早已经扬名立万,他们的研究绝对是有分量、值得期待和深入探讨的。惟其如此,我们才能真正做到兼容并蓄,译著方可见其效。为了选取最

具代表性的著作,我们征询了多位国内外著名政治学者,听取他们的推荐建议。最终入选者,都经由多位学者同时推荐,再经我们反复阅读,了解其重要性和可读性之后,才确定列入译丛。

我们认为,尽管中国政治学三十年来获得了巨大发展,但是,放宽中国政治学的国际视野,提升与世界最前沿政治学研究对话的水平,仍然是中国政治学的当务之急。希望我们的努力能够为之添砖加瓦。

是为序。

《复旦政治学译丛》编委会

2011年10月25日

献给我的母亲
绿蒂·贝克尔·拉克曼

并纪念我的父亲
卡尔·爱德华·拉克曼

致 谢

这本书筹备已久。多年来,许多师长、同事和学生都以种种方式为之提供诸多协助和建议。在我专就本书制订计划之前很久,他们就在近代早期欧洲的历史社会学概况和资本主义发展的思考方面给予我方向和引导,尤其是我在普林斯顿和哈佛的师长们:吉尔伯特·罗斯曼(Gilbert Rozman)、马里恩·列维(Marion Levy)、西达·斯考切波(Theda Skocpol)、哈里森·怀特(Harrison White)、约翰·帕吉特(John Padgett)、乔治·荷曼斯(George Homans)、罗恩·布里杰(Ron Breiger)和格斯塔·埃斯平-安德森(Gosta Esping-Anderson)。西达、约翰,特别是哈里森,即便在他们和我离开哈佛之后,他们都仍然继续对我的工作提供建议和敏锐的见解。

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和纽约州立大学奥尔巴尼分校的同事们针对各章草稿或我的观点较早、篇幅短小的版本提出了有益的评论。在麦迪逊,埃里克·欧林·赖特(Erik Olin Wright)、艾文·萨列尼(Ivan Szelenyi)、杰拉尔德·马威尔(Gerald Marwell)、罗恩·阿明乍德(Ron Aminzade)、帕姆·奥列弗(Pam Oliver)、安·奥尔洛夫(Ann Orloff)、沃夫冈·斯崔克(Wolfgang Streck)和罗伯特·弗兰左思(Roberto Franzosi)结合了友情与建议,从而在威斯康星大学社会学正统说教中给予我安慰。在奥尔巴尼,斯蒂文·赛德曼(Steven Seidman)、约翰·罗根(John Logan)和罗恩·雅可布斯(Ron Jacobs)提了不少建议,引导我修改本书不同章节。

当我事先在学术研讨会和讨论中提及这些历史及理论时，威斯康星和奥尔巴尼的学生们充当了适宜的关键受众。他们的问题和异议激发我重新思考和写作。我想对两位出色的研究生助教予以特别致谢。斯蒂芬·彼得森(Stephen Petterson)花了一年时间研究文艺复兴时期佛罗伦萨(Renaissance Florence)并帮我撰写第三章最初的草稿。尽管最终版本与斯蒂芬和我随后改写的相去甚远，他的工作为我其后就意大利城邦(city-states)的思考和写作提供了一块基石。朱莉娅·亚当斯(Julia Adams)与我合作撰写了一篇《绝对主义的矛盾》(“Absolutism's Antinomies”),使我的思考聚焦旧制度(ancien régime)时期法国国家的发展。朱莉娅也帮我开始对荷兰的研究;她自己对该国的研究也引导了我的思考。朱莉娅对诸多章节都有评论,她已经是超过二十年的至交了。

对寻求建议,我从不腼腆,然而在照这些建议行事时我经常是个老顽固。因此,尽管本书得到了如此多卓越学者们的建议,但对书中出现的任何错误和缺点,我必须承担全部责任。我想对下列给我提供有益参考书目和尖锐批评的历史学家和社会学家表示感谢,他们或曾与我在不同场合会面,或曾对我的书面请求予以慷慨答复。他们是:查尔斯·梯利(Charles Tilly)、伊曼纽尔·沃勒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迈克尔·曼(Michael Mann)、埃瑞克·霍布斯鲍姆(Eric Hobsbawm)、罗伯特·布兰那(Robert Brenner)、多米尼克·朱利亚(Dominique Julia)、米歇尔·维沃尔(Michel Vovelle)、威廉·贝克(William Beik)、大卫·帕克尔(David Parker)、詹姆斯·柯林斯(James Collins)、多门尼科·赛拉(Domenico Sella)、米歇尔·奇摩(Michael Kimmel)、埃德加·基辛(Edgar Kiser)、丽贝卡·吉恩·埃弥克(Rebecca Jean Emigh)、马克·古尔德(Mark Gould)、格雷格·库克斯(Greg Hooks)、玛丽·福布鲁克(Mary Fulbrook)和罗斯玛丽·霍普克罗夫特(Rosemary Hopcroft)。

导言部分曾有一个更早的版本之前以《没有阶级斗争的阶级形成》(“Class Formation without Class Struggle”)为名刊载于《美国社会学评论》(*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第55卷(1990)第398—414页。第四章部分曾出现于我的文章《16和17世纪英国和法国的精英斗争与国家形成》(“Elite Conflict and State Formation in 16th- and 17th-Century England and France”),参见《美国社会学评论》第54卷(1989)第141—162页,以及与朱利娅·亚当斯合著的《绝对主义的矛盾:阶级形成、国家财政结构与法国革命的起源》(“Absolutism's Antinomies: Class Formation, State Fiscal Structures, and the Origins of the French Revolution”),该文章载于《政治权力和社会理论》(*Political Power and Social Theory*)第7卷(1998)第135—175页。第六章有几页是从我之前的论著《从庄园到市场:英格兰的结构变迁,1536—1640》(*From Manor to Market: Structural Change in England, 1536—1640*, 1987)中摘录下来的。第七章的一部分之前曾以《国家、教会和巫术的消亡》(“State, Church, and the Distabishment of Magic”)为题刊载于大卫·李·米勒(David Lee Miller)等主编的《英国文艺复兴文化的生产》一书(*The Production of English Renaissance Culture*, 1994)。

不管我何时遭遇电脑问题,我的妻子林恩·米勒-拉克曼(Lyn Miller-Lachmann)都会过来帮我。她对我必将完成此书的信心一直支撑着我。我的孩子们,德里克(Derrick)和麦德琳(Madeleine),转移了我的注意力并延缓了我的进度,但我为此十分愉悦。最后,我的先父卡尔·爱德华·拉克曼,以及我母亲绿蒂·贝克尔·拉克曼,在诸多方面(我至今尚能历数)培养了我的智力发育。我将此书献给他们。

理查德·拉克曼
奥尔巴尼,纽约
1998年8月

目 录

致谢	1
第一章 西欧巨变	1
作为历史行动主体的精英和阶级 /	12
本书的安排 /	21
第二章 封建制的动力	26
多布关于转型的马克思主义理论 /	27
资本主义行为的物质制约 /	30
英格兰和法国的精英和农业阶级关系 (1100—1450 年) /	40
庄园结构在英格兰和法国的延续 /	59
对“亚细亚生产方式”的简注 /	61
第三章 城市资本主义的局限	64
韦伯及其批评 /	65
构筑一个城邦兴亡的结构模型 /	75
城市力量的人口测度(1300—1700 年) /	76
城市自治权的基础 /	84
佛罗伦萨的独特性 /	91
佛罗伦萨的政治斗争和结构变迁, 1100—1737 年 /	94
佛罗伦萨政治体制的经济局限 /	121

第四章	国家形成:英格兰和法国	149
	英格兰和法国的宗教改革与精英分裂 /	151
	英格兰 /	165
	法国 /	191
第五章	死胡同和绕远路——西班牙和尼德兰	234
	西班牙 /	237
	尼德兰 /	253
	西班牙和荷兰的政体比较 /	269
第六章	精英的自我防卫和阶级关系的转变:英国和法国	276
	地主们对精英斗争的回应:从宗教改革到	
	1640 年代英法两国控制土地的各种策略 /	277
	农民的抗争和农业阶级关系的定型 /	292
	英格兰和法国的经济发展 /	307
	从农业资本主义到工业资本主义 /	327
第七章	宗教和意识形态	332
	对韦伯的挑战 /	334
	精英、教会的独立性和宗教改革 /	346
	制度层面和意识形态层面的宗教改革 /	348
	理性和结构 /	353
	理性及其局限 /	366
第八章	结论	370
	非精英行动者和革命 /	376

地缘政治和世界体系 / 379

意识形态和文化 / 384

行动者的社会空间 / 387

参考文献 390

第一章 西欧巨变

15 至 18 世纪,西欧酝酿着巨变。社会学的奠基者们相信这一学科的使命就是去定义到底发生了什么变化,并解释它为何发生,在何时何地发生。卡尔·马克思、马克斯·韦伯以及埃米尔·涂尔干都将他们的精神生活献身这一事业。在过去的 20 世纪中,相关领域的社会学家和学者们对于欧洲转型的显著特征的认识意见分歧,这也界定了他们各自的学说^①。

正如在他们生活的物质条件方面一样,欧洲人在智识和精神方面也发生了变迁。这首先肇端于罗马天主教内部,然后是新教徒——一个成长中的思想者群体发展了对自然界、人体和思维的全新理解。新知识起初以重新发现旧经典的面貌出现。文艺复兴就源于对那些“失落”在修道院和贵族图书馆中的希腊、拉丁手稿的重印与注释。发生在基督教欧洲的这一智识的觉醒也利用了中东、北非和西班牙良好的图书馆和深植于穆斯林和犹太社会内部的学术社团的成果。

学术发展的步子随着活字印刷的发明大大加快。这一新技术使个人和公共机构的图书馆得以收藏古典和同时代作者的作品。“印刷术的出现完全改变了文本生产、流通和消费的条件。……它防止了文献讹误,更长久地保存文本,并使之不断加速积累。它使跨文化交流的新形式和系统性大规模数据搜集成为可能”(Eisenstein 1969, p. 24)。

① 马克思、韦伯和涂尔干也思考自由、民主和团结的转型的意涵。本书仅关注解释欧洲社会变迁。我不参与第一代社会学家(the first sociologists)从历史中导出伦理训诫的努力之中,虽然第八章的模型提供了部分政治经验。

知识探索部分地受重读经典文献(从深奥的到平常的)的影响。哥白尼、开普勒和伽利略改变了欧洲人对待天体的概念。他们对夜空的系统观察引导他们得出日心说来取代教会所认可的地心说模型。值得注意的是,当哥白尼将阐述他发现的书信和手稿发给一位与他保持通信的高级神职人员时,其观点不但被容忍,甚至还得到了鼓励。当伽利略将他那些与哥白尼相似的理论印刷在所有人都可购买的书上时,他才激怒了教会。

大部分书则主要关注日常的主题。一波声势浩大的农业创新肇始于15世纪。农夫们发展了改良种子家系、新农作物、更有效的轮作,并发明了灌溉和排水技术。遍及西欧的以多种语言印刷的小册子和流行期刊,使得上述每一种创新在它被成功采用的数十年内就都已广为人知。随后,色情文学变成了这种新技术的重要应用,流行一时。多数书籍都涉及色情主题。不过,色情作品也会谈及——有时直接,有时暗示——政治论战。哲学家们用知识和社会论战直接挑战了王室、贵族和教士的特权;而色情文学作者则以嘲讽奚落和对另类的“亲和力”(alternative elective affinities)^①的反复幻想暗中侵蚀社会秩序^②。越来越多的人可以阅读数量丰富的最新书籍、报纸和期刊。在英国和荷兰,识字率从中世纪时不足总人口的十分之一上升至17世纪时超过成年人的三分之一,法国同期或许也提升到了四分之一。

文学、哲学、宗教、科学,以及政治论述结合起来颠覆了对盛行

① elective affinity 借用了歌德的第三部小说《亲和力》的书名,指人的自然情感,往往与伦理和道德格格不入。——译者注。

② Darnton(1991)提供了一份有价值的对近来的阅读史研究的概览,见“History of Reading”, in Peter Burke ed., *New Perspectives on Historical Writing*, Pennsylvania State University Press, 1991, pp. 140-167。剧作家彼得·魏斯(Peter Weiss)在其戏剧代表作《马拉/萨德》(*Marat/Sade*)中,以及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在其全部作品中,都以不同的方式展示了全景式权力和性权力的危险性。